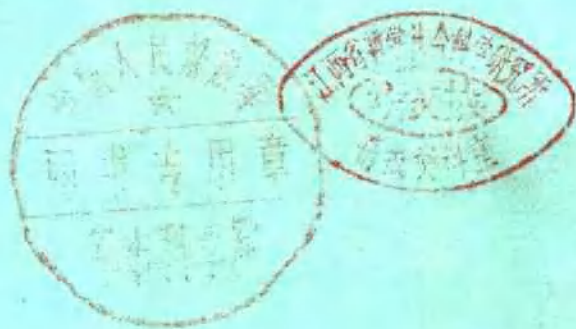


建所三周年

学术论文选

1980、6—1983、6

文学·历史



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前 言

经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于一九八〇年六月建立。三年来，在省委领导下，全所同志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双百”方针，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联系我省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和四化建设的实际，积极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在一些学术领域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值此建所三周年之际，为促进学术交流，进一步搞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我们从本所近三年的研究成果中挑选其中的一部分，编成《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论文选》一书，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文史四个专集。

这次收集的部分论文，从各学科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同志们的学习和研究成果。其中大部分论文曾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有些被全国性报刊转载，也有一部分在内刊上登载或提交全国、全省有关学术讨论会作为会议论文。由本所研究人员主持编写或参加编写经出版社出版的论著和政治理论书籍另有单行本，均未收入本书。

当前，社会科学事业正在蓬勃发展，全所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决心认真总结经验，克服缺点，努力攀登，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新贡献。以后根据需要，将另行编印新的论文选。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编书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83年6月

1983年6月

目 录

毛泽东思想同样是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	尹湘豪 (1)
一九三〇年的“二·七”会议·····	陈荣华 (10)
毛泽东同志一九三〇年底在吉水等地的 农村调查·····	陈荣华 (18)
试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 诞生及其历史意义·····	陈荣华 何友良 阎中恒 (30)
慎重初战原则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的 提出和运用·····	何友良 (51)
对第五次反“围剿”两个战略性建议的 管见·····	何友良 (58)
对洋务运动几个问题的管见·····	陈永武 (68)
“自立军败于龙泽厚、文廷式告密” 说辨讹·····	汪叔子 (87)
关于自立军汉口失败的教训·····	汪叔子 (97)
解缙与《永乐大典》·····	汪叔子 (106)
诗情·画意·爱国篇 ——读宋诗札记·····	郭文玉 (113)
谈李煜及其词·····	王 河 (117)
时空艺术的交融 ——王维“诗中有画”新探·····	黄南南 (127)
“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试解·····	赖功欧 (139)

地方史志问题浅谈·····	尹湘豪 (149)
与江西客家有关的几个问题·····	尹湘豪 (158)
十九世纪英法在埃及的斗争·····	王明美 (166)

毛泽东思想同样是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

尹湘豪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接着又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思想不仅是各项革命工作的指导思想，而且是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

—

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历史研究。他从学生时代开始就爱好历史和重视历史，以后对开展历史研究工作又进行了具体的指导。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毛泽东同志在十六岁时，向往过“中国古代的尧、舜、秦皇、汉武的事迹”，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同时也读了“一些外国历史”，如《世界英杰传》就是其中的一部（第一一四页，一九七九年三联书店版）。以后他又读了《御批通鉴辑览》——这是一部比较详细的中国通史著作，并且“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第一一九、一二〇页，同上。197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

时代》，所记相同）。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要求党的干部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注意收集地方志。他还要范文澜等同志编写《中国通史简编》等书，作为干部学习的教材（见《中国通史简编·绪言》）。他曾经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由此可见，他十分重视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他还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见《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在这里，他把“历史知识”作为革命政党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于是，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性就更加显著了。

也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干部会议上批评了那些不学习历史、不研究历史的同志之后，说：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进行研究，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该先对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进行分析的研究，然后再做综合的研究（见《改造我们的学习》）。这是对历史研究提出分工合作的有规划的集体研究措施。一九四二年三月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上，他又做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见一九八〇年第一期《党史研究》，又见一九八一年第四期《教学与研究》），除了说明研究党史的重要性之外，还提出了研究党史的具体方法。

解放以后，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编写地方志的任务，以继承我国修史编志的优良传统，发挥历史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重要作用。至今有许多省、县编印了新省志和新

县志，毫无疑问，这是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分不开的。

二

为了革命的需要，毛泽东同志曾经深入地研究过历史，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这种从实际需要出发而研究历史的典范作用，对我们很有指导意义。

熟读过《毛泽东选集》的人都能体会到，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有些是建立在深厚的历史知识的基础之上的。例如他曾经深入研究过战争史、农民运动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并且把研究的成果运用到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之中。

先就战争史来说吧。毛泽东同志曾经研究过古今中外的许多有名的战争。如齐鲁的长勺之战。晋楚的城濮之战、韩信的破赵之战、楚汉的成皋之战、新汉的昆阳之战、袁曹的官渡之战、吴魏的赤壁之战、吴蜀的彝陵之战、秦晋的淝水之战、拿破仑的多数战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等，他都研究过，并且认为它们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的，从而深信“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得出战争的胜负可以改变的结论，用以指导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对一九三三年阿比西尼亚的抗意战争和一九四二年的斯大林格勒之战，他也深入研究过。他认为阿比西尼亚只用阵地战而不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犯了战略上的大错误，所以导致失败；如能在失败以后把游击战坚持下去，还可以在未来的世界变动中恢复其祖国（见《论持久战》）。他断言斯大林格勒之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认为苏联在这次战役中采取了先则诱敌深入，继则顽强抵抗的正确战略方针，希特勒则犯了分败兵力的战略错误，必然招致失败（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他的预见后来都成了事实，对战略方针的分析非常正确，因而成为我国抗日战争战略决策的借鉴。

再说到农民运动史，毛泽东同志经过研究得出结论说：在封建社会里为地主、贵族和皇室种地的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没有人身自由”，随意受“打骂甚至处死”，因而要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第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还说：农民运动总是陷于失败和被地主贵族利用了去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其原因是由于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见《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对农民运动的发生根源、历史作用、失败原因，作了规律性的探讨，从而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指明了方向，为它提出了不再陷于失败的战略和策略，从而阐明了工农联盟的理论和政策。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方面，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到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趋势：一方面，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破坏了；一方面城乡的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了。资本主义国家再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于是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概括出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为半殖民地的十种残酷手段，和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的六个特点（见《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雄辩地论证了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廓清了以前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的许多错误看法。他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

的力量、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任务。”（同上）不仅如此，他对中国革命的步骤问题、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形式和政权形式的问题，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彻底性问题、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农村包围城市问题、湘赣等省边区的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问题、抗日战争的持久性问题、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等，无一不以社会性质作为依据去进行解决。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所进行的历史研究，有明确的目的，有充分的材料，有深刻的分析，有科学的结论。这对我们史学工作者来说，很有指导意义，足以使我们认识到那种茫无目的，没有充分掌握材料，没有深刻进行分析，因而得不出科学结论，而于革命实际无补或无关的错误作法。

三

对历史研究特别具有指导作用的，是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和提出的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这些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保留在他的著作和讲话中，内容相当丰富。例如：

一、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告诉我们：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其立场、观点、方法是科学的，在历史研究中最能解决问题，因而必须以它们为指导。

二、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该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象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这告

诉我们，在研究历史时，第一，要研究有用的规律，以指导我们的行动；第二，要详细占有资料，采用科学方法。以后提出的“古为今用”和“厚今薄古”，也是要求研究有用的东西。

三、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五四时期的许多领导人“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告诉我们，在历史研究中要有批判精神，因为以前的历史中包含了许多封建糟粕等方面的东西；而这种批判精神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

四、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提到：“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解放初期，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时，有些人弄不清武训其人的真实历史面貌，书本上的材料又很少，于是派出若干人员到武训的家乡去进行实地调查和使用阶级分析方法，终于把武训的问题解决了。

五、在《矛盾论》中指出：“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这告诉我们：研究历史不要主观、片面和表面化，而要客观、全面和深入实质。又指出：“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告诉我们：研究历史要进行分析，不能套公式和一刀切。他还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找出他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这

告诉我们，研究历史要能够找出主要问题和解决主要问题。许多史学工作者研究我国的封建社会时，首先研究土地问题和农民战争问题，这是符合这种方法的。

六、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说到：“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党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这是要我们用“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和“古今中外法”去研究党史及其他历史。这“古今中外法”很具体，很有针对性，可以针砭历史研究中的片面观点和狭隘思想。

七、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毛泽东同志驳斥过艾奇逊的唯心历史观。艾奇逊认为中国发生革命的原因，是由于人口太多和受外来影响。他这种人口太多论和外因论不足以解释历史，是唯心史观的谬论。我们应该以此为忌，不要犯此错误。这也是对我们的具体指导。

其他的不再一一列举。

四

以上所述，足以证明毛泽东思想同样是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我们史学工作者，应该很好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提高研究水平，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避免不犯或少犯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这非常形象地说明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

可是有个别的人不以此为然。例如在讨论“史”与“论”的

关系问题中，曾经有一种主张认为：“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这三个口号“不宜提倡”，就是不以此为然的表现。

要知道，这三个口号尽是解放以后提出来的，而且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家用来指导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其所谓的“史”，是指史料；其所谓的“论”，是指理论。而这里所指的理论，不是别的理论，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一九六二年就有人指出过：“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必须把史和论结合起来，所谓史就是史料，所谓论就是理论。我们所说的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见《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78页）由此可知，说三个口号“不宜提倡”，岂不等于说这种“论”也不宜提倡吗？

上述这种主张所持的理由是什么呢？是说三个口号都有“弊病”。但是依我看来，这三个口号的“弊病”，只是人们自己在理解上和运用上的“弊病”，如果理解得全面，运用得恰当，那就不会有什么“弊病”。举例来说吧。用阶级分析方法去分析阶级社会的历史，这无疑地是正确的。在阶级社会中，一个政治集团，一项重要政策，一个历史人物，无不具有阶级属性和打上阶级烙印，我们能够用阶级分析方法去进行分析，而且分析得全面和恰当，就更能看清楚历史的实质和人物的真实面目。这有什么“弊病”可言？其次，我认为即使在应用三个口号时产生“弊病”，也不能说三个口号“不宜提倡”，正如吃饭哽喉，不能说不宜吃饭一样。

最后还应当指出，这种主张在否定三个口号之后，自己又没有什么办法去解决“史”与“论”的关系问题，而只是空发议论；究竟怎样去“保证和促进历史学的健康发展”呢，没有交待；怎样去“验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用”呢？更令人茫然。

说到这里，我认为我们都需要进一步学习、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它们为指导，共同推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一九三〇年的“二·七”会议

陈荣华

一

1930年2月6日至2月9日，红四军前委与红五、六军军委、中共赣西特委等，在江西省吉安县的陂头村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期间正逢“二·七”大罢工七周年纪念日，会议名称遂由此而来①。

这次会议，是由红四军前委建议召开的，与会代表有：红四军前委代表团，红五、六军军委代表②，中共赣西特委代表，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赣西临时工农民主政府党团代表，以及参加中共赣西特委扩大会议的代表，各中心县、区负责人，六军各纵队负责人等四十余名。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前委代表团领导这次会议，并代表前委在会上作了《目前的形势及党的任务的报告》。会议讨论研究了武装群众、扩大红军、建立红色政权和分配土地等重大问题。会议的内容及成果，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与确定了党和红军当时革命的总目标与方针、策略。

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报告的精神，首先研究、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中国军阀混战日益扩大，财政危机遍及全国，工农士兵、城市贫民的反抗运动到处发展，打起红旗的工农士兵、贫民群众，在三百万以上。那种夸大敌人力量，忽视革命力量，不相信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不赞成扩大与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右倾悲观论调是错误的。会议认为：“全国形势到了革命高潮之

门前，江西有首先夺取的可能”。③会议还回顾了赣西南革命斗争的历程，批评了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即张怀万）对赣西特委的责难。认为赣西特委成立以后，批判了右倾悲观思想，实行了“土地、政权、武装同时并进”的方针，创造了红六军，成立了赣西工农民主政府，以及组织群众“攻打吉安”的斗争，等等，其工作成绩是主要的。

在估量政治形势，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二·七”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争取江西”的计划，为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确定了总的斗争目标和方针、策略，即：1、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是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2、深入土地革命，3、扩大工农武装。为了加强党对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领导，会议决定将中共赣西、赣南两特委合并，成立中共赣西南特委。决定召开赣西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确定赣西党的工作部署，选举产生特委的领导机构。决定由赣西特委筹备召开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江西省工农民主政府。因赣南地方党组织的领袖未能出席参加这次会议，又决定会后召开赣南工作会议。

会议号召革命根据地军民，为实现“二·七”会议的伟大斗争目标和各项具体工作任务而努力奋斗。指出：“从前所没有的艰苦斗争将随着革命势力的前进而到来。但是艰苦斗争的前途则必需是：全国革命高潮援助南方革命势力，南方革命势力则要汇合全国的革命势力把统治阶级完全埋葬。”④

第二，会议制订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土地法》，决定立即全面开展土地革命运动。

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问题，是“二·七”会议前与会议上着重讨论和研究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在赣西南党内，由于对土地革命在民主革命阶级中的目的、意义、以及分配的原则有着不同的认识，所以在要不要及时开展土地改革和如何分配土地的问题

上，曾存在过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及主张。以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赣西临时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曾山和特委委员、延福区委负责人郭承禄为代表的多数同志，主张在暴动胜利后，应立即进行土地改革，按人口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以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和特委委员、赣西临时工农民主政府党团代表林文林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制造种种借口，延迟土地改革，并“主张按耕种能力多少来分配土地，即谁种得多，谁就可以多分土地，谁耕种能力少，或无耕具的雇农少分、以至不分土地”。会上，毛泽东同志着重阐述了党在农村中，“团结雇农、贫农，巩固中农同盟，向地主富农斗争”，彻底实现土地革命的必要性。并赞成刘士奇、曾山等同志的主张。指出：“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是正确的，谁种得多，谁就多分土地的办法是富农路线。”⑤因为只有富农劳动多，农具全，肥料、种籽足，耕种能力强，而贫、雇农的耕作能力则很差，所以按耕种能力大小分田，是有利于富农而不利贫、雇农的错误政策。

经过充分讨论，与会大多数代表同意毛泽东、刘士奇、曾山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及主张。指出，不论何地凡暴动驱逐了豪绅之后，须立即没收土地按人口平分与农民耕种。只有彻底平分，才能满足广大贫苦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争取他们积极参加建设与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只有平分，方法比较简便，易为农民接受与掌握，使分田斗争适应于革命战争环境的需要。会议还批判与抵制了建立“集体农场制”的主张。

经过认真讨论，会议就土地问题“作出了两个字的结论：一要‘分’，二要‘快’”⑥。会议很据闽西土地斗争的经验和红四军前委在各地调查研究所得的材料。制订了革命的土地法——《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土地法》，“决定没收一切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抽多补少”⑦。并责令各县、区负责同志，限期把土地分配到农民手里。

第三，会议决定成立总前委。

会议认为，为了加强党对土地革命战争的领导，统一红军与地方党组织、工农民主政府的行动，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有组织一最高指导机关的迫切需要。以前中央任命的随四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的前委，应该扩大其任务，担负起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扩大革命武装，夺取江西全省革命胜利的伟大历史使命，故决定成立总前委，由四、五、六军和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主要负责同志：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方志敏、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潘星元、刘士奇、曾山、袁国平、李文林、郭贞、王怀同志等十七人为委员。总前委推选毛泽东、朱德、潘星元、刘士奇、曾山、彭德怀和黄公略等同志为常委与后补常委，以毛泽东为书记。

至此，历时四天的“二·七”会议，宣告胜利结束。

二

“二·七”陂头联产会议，迎着革命高潮的来临，为党和红军提出了扩大与巩固革命根据地的行动纲领，它在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史上，是一次极重要的会议。

第一、“二·七”会议，首先是关于发展与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一次战略性会议。

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一个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的时候，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过高估计革命力量，过低估计了反革命力量，主张以城市为中心大干一番，最后走上了盲动主义的道路，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又有一部分同志则过低估计了革命力量，过高估计了反革命力量，产生右倾悲观思想，害怕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奋斗，主张流动游击，结果在革命高潮面前束手无策，甚至怀疑动摇。这是两种错误的倾向。然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领导者，他们在对革命的主客条件作出实事求是的估量的基础上，提出了“夺取江西全省”，创造江西全